

“疑古思潮”与“伤寒错简派”的兴起

尹笑丹¹, 徐昉², 康利高阁², 徐江雁¹

(¹河南中医学院, 郑州 450016; ²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 自晋代王叔和重新编次《伤寒论》之后,《伤寒论》逐渐成为历代中医学者必读的经典著作。由于受到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中的“疑古思潮”的启发,晚明兴起了“伤寒错简”思想,这种思想为临床医家研究《伤寒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做为清代《伤寒论》研究主流方式的“伤寒错简”思想,既是中医学学术思想内在发展规律的结果,也与中国学术思潮的更替密切相关。

关键词: 疑古思潮; 伤寒错简派; 伤寒论

基金资助: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0年度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专项(No.2010GJ07-02)

Relationship between 'doubting the ancient thoughts' and the rising of 'cuojian school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YIN Xiao-dan¹, XU Fang², KANG Li-gao-ge², XU Jiang-yan¹

(¹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16, China; ²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lassic works of all previous dynasties schola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quired since the Jin dynasty WANG Shu-he editing order it again.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doubting the ancient thoughts', 'cuojian school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thought, rised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provided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the clinical doctor o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n Qing dynasty, 'cuojian school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thought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la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placement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s. This article try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thoughts and forme a new study angle of 'cuojian school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thought.

Key words: Doubting the ancient thoughts; 'cuojian school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Fund assistance: Special Foundation for TCM Public Health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2010 (No.2010GJ07-02)

《伤寒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诊疗体系,奠定了中医外感疾病乃至临床各科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自晋代王叔和拾掇丛残,重新编次《伤寒论》后,《伤寒论》一直是历代中医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著作。晚明兴起的“伤寒错简”思想是历代注解、训诂《伤寒论》等研究方法的拓展,也与隐现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中的“疑古思潮”有着密切联系。文章拟通过对“疑古思潮”与“伤寒错简派”思想流变的考察,力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

“疑古思潮”的兴起及其学术特点

1. 疑古思潮的兴起 中国思想一向以经学为主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章句之学博兴,迄至唐开、天年间,儒士说经一尊师承家法,以训诂经传、解释名物为治学方法,虽“义

有同异,亦率曲为附合,不复稍更”^[1]。安史之乱以后,旧有的经济政治局面遭到严重破坏,思想界也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注疏之学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变革的呼声,以刘知几、韩愈、柳宗元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高举“疑古惑经”的大旗,开创了儒学以经驳传、扬弃注疏、回归经典,直接从先秦经典中领会经典精神的学术风气。这种自由解释儒家典籍的风气,是宋初普遍兴起的自由解经的先声,为儒家“义理学派”——理学的产生扫清了障碍。

“宋初经学,犹是唐学”^[2]。北宋初年,北宋中央政府在文化领域采取了因循唐代的方针。一方面,开科取士,“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3],取舍于《五经正义》之间;另一方面,组织以邢昺为首的

学者重新校订《五经正义》，改正注疏，确定“经学教科书”。在看似仍是“注疏学派”一统学界的局面中，“疑古思潮”仍就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则为对“经学”义理的阐发与“经文”原典的改易增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北宋初邢昺所校定的《论语正义》中说到：“今观其书，大抵剪皇氏（皇侃，南北朝梁代经学家，著有《论语注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4]。邢昺《论语正义》一书，一方面“详于名物训诂”，一方面又“稍傅以义理”，虽未尽尊汉唐“经学”明章句、重训诂的学风，却开辟了宋儒“以理说经”的先河，邢昺之后，理学勃兴，“以理解经”蔚为风气，成为宋儒迥别于汉唐诸儒的新的学术研究方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可谓道尽了宋代儒学发展的脉络。

自兹而后，诂训之学益微，义理之学渐兴，“我注六经”变为“六经注我”，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为儒家学说开创了新的局面。

2. “疑古思潮”的学术特点及在明清时期的发展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已说”^[5]，宋代经学被后世学者称为“经学变古时代”，正是对宋儒这种敢于疑古、变古的最好说明，也是“疑古”学者的学术特点。

宋儒“改经”以朱熹为代表，其所注《大学章句》，即以己意分别经传、改换次序，晚年更改定《仪礼》著《仪礼经传通释》，分合篇章，杂以他书，重新编纂。

元明继之，辨伪疑经之风大盛，元儒吴澄本朱子之意，著《五经纂言》，对儒家经典多有改换。明代学者，更是推广辨伪学风，遍考四部之书，定其真伪，从而出现了第一部辨伪学专著——宋濂的《诸子辨》。自兹而后“此风传入医家，而伤寒六经之编次，且与周官冬官之补亡同为一聚讼之公案焉”^[6]。

“疑古思想”在宋代的发展，对后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造成了学术研究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促成了学界回归原始经典思想的形成。

“疑古”思潮对宋元医学的影响

在医学界，北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组织开展了以国家力量对医籍的大规模校订工作，在局诸人汇众本、校异同，确定了后世医书的“范本”，可以认为是自两汉至宋初“训诂考证”学风在医学界的投影。

金代成无己所著《注解伤寒论》随文顺释、解释

字词，《伤寒明理论》则“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严器之序），重在仲景学理的阐发，可以认为是医学界由注疏向义理转变的“转关”。元代名医滑寿，病“素问内多错简……难经虽本灵素，缺误亦多”，于是“类而抄之”“注而读之”^[7]，则是医界增删改易经文的代表。

流波所及，金元明清时期中医学界相继出现了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学术流派，或主“温补”，或主“攻下”，或主“相火”，或执“命门”，或援易入医，大阐医易相通，甚而脱胎出“温病学派”。一时之间，中医学学术各倡新说，“百家争鸣”，流派纷呈，中医“义理”学——中医理论，正是在这种争鸣中得到了极大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良有以也。

“伤寒错简派”思想的考察

1. 明代“错简思想”的发展
明代伊始，“错简派”由王履等首发其端，《明史·王履传》云：“（履）尝谓张仲景《伤寒论》为诸家祖，后人不能出其范围。且《素问》云‘伤寒为病热’，言常不言变，至仲景始分寒热，然义犹未尽。乃备常与变，作《伤寒立法考》。又谓《阳明篇》无目痛，《少阴篇》言胸背满不言痛，《太阴篇》无嗝干，《厥阴篇》无囊缩，必有脱简。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者二百三十八条，复增益之，仍为三百九十七法。极论内外伤经旨异同，并《中风》、《中暑辨》，名曰《溯洄集》，凡二十一篇”^[8]，可见王履已做过对《伤寒论》的增删改易之工。

“错简学说”虽由王履发其端，但其肇始却可上推于朱丹溪。史谓王履“受业于金华朱彦修，尽得其术”（《明史·本传》），朱丹溪思想对王履的影响不可忽视。朱丹溪师承有自，所学多门，其学贯穿儒、医，皆有所成。朱丹溪习医于宋末名医罗知悌，得张元素再传之学；学儒于金履祥、许谦，为朱熹之四传。师门授受，使得他具备了“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除了奋起改正时医滥用温燥，套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局面，在对《黄帝内经》及《伤寒论》的研究中也沿用了这一治学方法。戴良《丹溪翁传》载，

“罗成之自金陵来见，自以为精仲景学。翁曰：‘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篇断简之余，然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吾每观之，不能无疑’因略摘疑义数条以示，罗尚未悟”^[9]。从戴良的记载和师门传统来看，朱丹溪对《伤寒论》的研究，也颇有“错简派”的特点。可以说，朱丹溪为明清“伤寒错简派”之滥觞。

2. “错简派”的最终形成
自王履提出《伤寒

论》“必有脱简”之论后,诸多医家如吕复、陶华、黄仲理、汪机等也对王叔和编次《伤寒论》颇有微词,力议王叔和编次之非,但多为推论,并未付诸实践。

至晚明方有执,方汇集众说,力揭大纛,倡言错简,对张仲景《伤寒论》原貌颇多推究,重编求古之风日甚,对清代伤寒研究影响极大。

方有执之后,喻嘉言推阐其意,著成《伤寒尚论篇》、《尚论后篇》,对方有执之说多有补苴,除六经仍以太阳经为纲外,增加了“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三大主病大纲,令《伤寒论》一书更加条理明晰,“伤寒错简派”最终形成。其后,张璐《伤寒赘论》、钱潢《伤寒溯源集》、周扬俊《伤寒论三注》、吴仪洛《伤寒分经》、徐忠可《伤寒图说》皆祖述方有执、喻嘉言,“错简重订”思想成为清代伤寒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小结

“改经”是“疑经惑古”必然的结局,自中唐刘

知己、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疑古思潮”,经元明诸儒的发挥阐扬,彻底打破了数百年来“注疏经学”一统学界的局面,高扬的“义理”旗帜,对“理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也间接影响了中医学说的发展,促成了中医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伤寒错简派”的产生正是这种学术思潮在医学界的延续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民国宁南武氏校印本
- [2]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45
- [3]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986
- [4]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
- [5] 皮锡瑞.经学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3
- [6] 吕思勉.章句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43
- [7] 张廷玉.明史·滑寿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85
- [8] 张廷玉.明史·王履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79
- [9] 田思胜.丹溪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231

(收稿日期:2014年5月25日)

·论著·

补泻手法与针刺量的关系研究

常晓波^{1,2},樊小农^{1,3},王舒^{1,4},张亚男¹,孟智宏¹,石学敏^{1,5}

(¹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300193; ²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二科,南昌 330006;

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刺量效关系三级实验室,天津 300193; 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针刺疗法

重点研究室,天津 300193; ⁵天津市针灸学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193)

摘要:文章从古代文献和现代针刺研究的角度探讨了针刺补泻与针刺量的关系:不应单纯以针刺量的大小来衡量针刺的补泻,刺激量大小与针刺补泻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刺激量大,可能为补,可能为泻;刺激量小,亦可能为补,亦可能为泻。同时,最佳刺激量是与患者的年龄、体质及病情等机体状态密切相关。针刺量本身是个相对量,以针刺的基本要素来衡量针刺量的大小,可以使针刺量化研究客观化。但若单纯以针刺量来衡量针刺补泻手法,未免会使针灸失去本来面目。毕竟,针刺量化不能等同于针刺简单化。针刺补泻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相对特异性,而真正的补泻手法是以患者的机体状态(虚损状态还是邪实状态)及针下的感觉(针下沉紧或松滑)为依据,选择合适的经穴(也依据经穴的特异性,补虚时尽量选择具有补虚作用的腧穴,泻邪时尽量选择具有泻邪作用的腧穴),在针刺得气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补虚或泻邪的术式结构来操作的,在施术过程中施以一定的刺激量,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针刺补泻的目的。

关键词:补泻手法;针刺量;针刺效应;机体状态;腧穴;经穴特异性

基金资助: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No.2012CB518505, No.2006CB504504, No.2010CB530500)

通讯作者:王舒,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314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研究所,邮编:300193,电话(传真):022-27432207
E-mail: wangs2008@163.com